

驼峰航线： 中美携手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 谭 刚

我们通往（中国）的运输线要保持畅通。”他的政治决断推动了驼峰航线的开辟运营。

1942年4月，驼峰航线正式开辟，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和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更是在中国西南陆路国际通道被封锁的关键时刻，中美两国维系中国战区抗战物资供应的重要举措。这条航线的开通，成为战时中美两国合作反法西斯的象征。

驼峰空运的中美协作

作为抗战后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大动脉，驼峰空运的任务由美军航空运输司令部与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其中美军占主导地位。美军航空运输司令部印度—中国空运总队机群规模，从1943年9月的225架增至1945年9月的600余架，月运量也从1943年9月的4624吨猛增至1945年7月的7.1万吨。运力的大幅提升得益于1944年10月C-54“空中霸王”（Sky-master）运输机的投入使用，这种四发运输机的载重是C-47运输机的3倍，携带3540加仑燃油可实现中印直飞往返。1945年7月美军创下了7.1万吨的单月运量纪录，相当于滇越铁路1940年6月月运量的4.7倍。在1942年4月到1945年9月期间，美军空运总队累计运送物资65万吨，充分体现了其在驼峰空运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航空公司运量相对较小。1942年7月1日，中国航空公司通过租借法案获得10架运输机，至1943年9月机队规模增至23架，1944年底达30架。随着机队规模扩大，中国航空公司的驼峰运量增长迅速，从1942年的1758吨增至1945年的19297吨，3年激增9.9倍。在1942年4月到1945年9月期间，中国航空公司通过驼峰空运累计向中国运入物资5万吨，运出物资近2.5万吨。从运输物资种类来看，中国航空公司输入物资包括兵工器材、军航器材、军需被服、飞机汽油、美军物资等，占当时中国航空公司输入总量的52.1%。

作为二战时期最危险的空中航线，驼峰空运面临气象恶劣、日军截击、飞行员经验不足等严峻挑战，飞行损失巨大。在3年运营期间，美军空运总队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13架，中国航空公司损失飞机50架。尽管飞行损失巨大，但在中美两国的

共同努力下，这条航线的运量逐年攀升。至1945年9月，仅美军空运总队便拥有2.6万名空、地勤人员与4.7万名民工共同维护运营这条航线。

中国远征军的空中补给与兵力调配

在二战亚洲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的缅甸北部作战面临严峻的后勤挑战。崇山峻岭的地形给物资地面运输造成巨大困难，加之日军对主要交通要道的控制，使中国军队获得地面补给困难重重。在这危急时刻，驼峰航线成为重要的空中补给线，为中国军队运送了大批武器弹药。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驼峰航线向中国远征军输送各类机关枪3387挺、战车防御炮70门、火箭筒524具、迫击炮284门、子弹1.64亿发。这些军火物资补给，提升了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为抗战后期中国缅印反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驼峰航线不仅运送了大量军火物资，而且快速调动了作战部队。1944年4月21日至5月23日，中国驻印军在进攻缅北孟拱河谷日军时，不料日军猛攻印缅边境的英帕尔，形成包抄之势。危急之际，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部快速将云南两个整师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至印度雷多和缅甸孟关等地增援。虽然这些部队并未直接参战，但他们的及时出现改变了战场态势，让日军不敢轻举妄动，使得前线部队转危为安。这种空运调兵的能力，成为扭转缅北孟拱战局的关键。

驼峰航线最辉煌的表现，当数1944年5月至8月的密支那战役。战役前，美军运输机就将第50师1.8万人从云南空运至印度，再通过地面运输将其送到缅甸，以增援中国驻印军。5月17日中美联军占领密支那机场后，该机场即成为驼峰航线的重要中转机场，提高了空运效率。次日就有运输机运来2500名战斗人员和大量工程设备。更为重要的是，新1军的第30师、14师和22师山炮兵部队直接乘运输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迅速投入战斗。整个战役期间，密支那机场共起降1.4万架次飞机，仅运输的器材就达4万吨。驼峰航线不仅保障了物资补给和兵力补充，也保障了伤员的救护运送，让士兵士气高涨。正是这种开创性的空中补给和兵力调动模式，为中国军队在缅北作战的胜利提供了重

要保障。

驻华美军作战与对日轰炸的后勤保障

在驼峰航线输送的物资中，约80%用于保障驻华美军作战。其中美军第14航空队是最大受益者，在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间，该航空队获得的驼峰空运物资占总量的51.26%。由于第14航空队通过驼峰航线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补给，其战斗力迅猛提升。在抗战最后3年，该航空队虽损失500架战机，却创下击毁2600架日机、重创25万吨日本船只的战果，成为打击日军的重要空中力量。

不仅如此，通过驼峰空运获得军火物资和燃油补给的美国驻华空军，也支持了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7月的缅北作战中，美军直接射击和轰炸日军地面部队，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与此同时，美军轰炸机利用驼峰空运返回之机多次轰炸日军的交通、仓库等设施，破坏了日军后勤供给，削弱了日军战斗力。

除了支持驻华美军作战外，驼峰空运也为马特洪恩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后勤保障。1943年8月，美军制定了B-29轰炸机从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马特洪恩计划。为保证这一计划取得成功，除了动用巨大人力物力在成都地区修建美军机场外，还通过驼峰空运将大批物资从印度运至成都机场，供美军第20航空队使用。根据航空运输司令部统计，到1944年底，美军空运总队运送了约34400吨物资到成都。在整个马特洪恩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军第20航空队在日本投掷4730吨炸弹。为此，第20航空队 and 美军空运总队共向中国空运了6.9万吨各种物资，相当于驼峰空运最初20个月的运输总吨位。驼峰空运为马特洪恩计划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驼峰航线既是中美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空中生命线，也是美国援华抗战的具体表现。这一航线突破了技术极限，不仅向中国远征军输送了大量军火物资，也为驻华美军提供了补给，彰显出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中美两国的密切协作，成为盟军在亚太战场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系主任、教授）

老龙头墓地： 青铜文明的汇集地

□ 周志清

老龙头墓地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毛家坝，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盐源盆地。墓地分布于一条东西向的山梁之上，核心面积约12000平方米。自2020年以来，老龙头墓地已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清理墓葬2042座、殉马坑1个，是西南地区近年来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这勾勒出老龙头墓地从商末至西汉早期跨越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脉络，完整构建了老龙头墓地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为西南地区文化谱系研究提供了关键标尺。

独特的文化面貌与内涵。老龙头墓地是盐源地区青铜文明的典范，被誉为四川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外的第三大青铜发现。老龙头墓地新一轮的发掘，揭示出盐源地区具有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与内涵。以老龙头墓地东周至西汉时期遗存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一支以盐源盆地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新的考古学文化。

老龙头墓葬有着数量众多、层叠叠压、头向统一的特点，显示出自商代至西汉时期长时间段连续发展的特征。墓口覆盖巨石的习惯是该墓地独特的形制特征，遗骸包裹、朱砂葬、“毁兵”、叠葬、屈肢葬等特色习俗丰富了西南夷的葬俗。

墓地出土器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域特色鲜明，三轮青铜马车、蛇蛙铜案、青铜腰肌、铜人俑、彩绘大双耳罐及各种双马神树枝形器和联星杖首等，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征。其中，造型特殊、主题多元的青铜树枝形器和案形器、千字型杖首等，是盐源老龙头墓地最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以人曾为主题的树枝形器是老龙头墓地最具特质的青铜文化元素，也是该墓地最具辨识度的器物。

双耳罐在老龙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除了日常生活或作为随葬品的陶质双耳罐外，还发现彩绘双耳罐以及青铜质地的双耳罐，枝形器中也可见其存在。青铜立人双手悬提的双耳罐和枝形器上双鹿或双羊对供的双耳罐，彰显出双耳罐在该文化中扮演着敛聚财富的象征。老龙头墓地主人通过“马帮”对盐源盆地盐业资源的控制与贸易获利，实现与周边地区的远程贸易，造就了老龙头青铜文化的繁盛景象，马和双耳罐随即成为当时社会地位或财富的象征。

此外，女性在老龙头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她们不仅承担制盐生产与贸易活动，而且参与献祭、战争。大量女性图像出现于青铜器上，她们不止出现于杖首和枝形器上，同时在女性墓葬中亦可发现大量兵器和马具的出土以及殉马习俗的使用，彰显了女性在当时盐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这是雅砻江女性文化悠久历史的呈现。

多元包容的习俗与信仰。从墓地遗存可见尚马之风兴盛，考古发现大量以马头为主的路头葬和随葬马具，同时马的元素充斥于树枝形器、打纬刀、鼓风管等器物之上，这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随葬马或马具习俗的代表。老龙头墓地尚马之风，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最为突出的印记。

双马神、太阳崇拜、双耳罐等代表了老龙头墓地独特的信仰传统。双马神是青铜树枝形器最为常见的主题，形象地展现了巫师通过助手神马经由神树天梯登日完成人神天地交通的场景，实现了生死世界之间的沟通。它是中国古代传统神树崇拜与来自欧亚草原双马神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崇拜为特征的萨满信仰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实证和具象存在。

腹部负日铜鸟、双鸟拱日枝形器、四鸟绕日铜镜等器物中，随处可见的太阳元素展现出这是一支向往而生的人群。而四鸟绕日的构图意境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如出一辙，显示其与古蜀人有着异曲同工的太阳崇拜，这也是中国古老的金乌逐日传说与古代人类太阳崇拜普遍信仰的缩影。

由上可见，老龙头青铜文化独特的文化面貌与内涵、多元包容的习俗与信仰，实证其是一支独树一帜、兼收并蓄的青铜文化，并表明

盐源青铜文化是西南地区一支独具特质而又复杂多样的地域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大家庭一支绚丽的奇葩。而这与盐源地区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洼地效应”是密不可分的。

独特的地理节点造就多元交融的文化特征。盐源是历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地理节点，它是藏彝走廊和边地半月形地带文化和民族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南北文化交汇于此，文化多元性与复合性特征突出，优越的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加持耦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老龙头青铜文化。

在商周时期，老龙头便受到安宁河流域的高坡文化和西北地区寺洼文化深刻影响。东周以降，来自滇文化的腰肌、石寨山型鼓、编钟、蛇首剑等“舶来品”盛行于老龙头，二者有着将纺织工具、铜鼓、编钟等作为墓主财富和地位象征的价值认同。双耳罐、山字格剑、铜柄铁剑等，与川西北和滇西北地区同类器有着相同之处。双圆饼首短剑、弧背刀/削、带铜镜、殉马和马具及铸匠墓等广泛发现，表明其受到了西北和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深远的影响。海贝、费昂斯珠、靴形钺等反映其与东南亚等地区的密切联系。此外，丰富的人骨遗骸为揭示“黄河上游—川西高原—云贵高原”人群之间的迁徙路线提供了遗传学线索，为西南与黄河地区古代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科学证据。

上述历史场景，见证了老龙头所在的盐源地区与中国西南和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及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表明盐源盆地是青铜时代南北文化汇集的熔炉，连接并吸纳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文明成果。

总而言之，老龙头墓地实证了中国古代西北与西南各族交融的历史，是研究青藏高原东部多元文明交汇、融合以及演进的关键钥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老龙头青铜文化丰富了中国古代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夯实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整体性与共同体，为“边疆发现中国”提供了鲜活案例。

（作者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老龙头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

楚国吴起变法中的吏治整顿

□ 张 敏

局势、运筹帷幄，又有参与魏国变法的经验，因此，他对楚国内部弊病洞若观火。虽然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人口、资源物产都位居前列，但政治上因循保守，封君在其封地内拥有治民权和司法权，权力过大，且不受中央监管；大族盘根错节，结党营私，冗官冗费的问题也很严重。据《韩非子·和氏篇》记载，吴起对楚悼王说：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说苑·指武篇》则记载了吴起与屈宜臼争论时阐述的变法思路：“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可见，吴起变法的核心主张就是削弱贵族特权，整饬吏治，以强化王权，提高楚国的国力和军力。

首先，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问题，吴起推行剥夺王室贵族政治特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效仿魏国李悝变法取消世卿世禄制，颁行减爵禄之令，封君传到第三代就收回其爵禄，从而削弱他们对楚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楚国疆域辽阔、人少地多，并且区域发展不均衡，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之也？”他

认为，楚国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必须加以纠正。因此，吴起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迫使旧贵族与其所属人员迁徙到广阔的边荒地区。这样既可以削弱旧贵族势力对中枢政治的影响，又有利于开发边疆、增强楚国的实力。

其次，吴起大力精简楚国机构，裁汰冗余官员，提高行政效率。《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把那些“无能”“无用”“不急”的官员和官位全部罢免裁汰掉。“无能”是指本身缺乏才能或不称职的官员，“罢无能”强调以能力为标准选拔人才。“无用”是指对国家治理完全没有贡献、无实际效用的职位或机构，“废无用”体现了吴起精简行政体系的改革思想。“不急”是指非紧急或非必要的官职，“损不急”强调优化官僚机构的核心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再次，为了保证吏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吴起针对楚国官场上由来已久的营私舞弊等痼疾，严加整肃，要求各级官吏禁绝私门请托，“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就是说，不能因个人的私利妨害公务，不能让坏人的谗言掩盖忠臣的净谏。要求官员说话不曲意逢迎，不因

他人言论而改变自己的主见；行事不迎合他人，不因外界压力或利益妥协立场；在面临危险时仍坚持道义，不因畏惧困难而放弃原则；践行道义时不回避风险，不计毁誉，一心为国家 and 君主效力。

最后，吴起采取优化国家财政支出、全力保障军费供给的政策，把裁汰下来的王室贵族及“无能”“无用”“不急”官吏的俸禄，都用在训练战士和加强军事国防建设上。《史记·吴起列传》对此记载说：“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由于切中时弊、目标明确、措施坚决，吴起变法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较大成效，使楚国由弱转强，并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史记·吴起列传》称：“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公元前381年，吴起率领楚军打败老对手魏国，饮马黄河，威震诸侯。

吴起变法的顺利推进，主要有赖于楚悼王的支持。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死，顽固保守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杀害了吴起，变法也因此戛然而止。

变法，意味着对旧有体制的挑战与重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吴起坚持变法的勇气可嘉，推动变革的智慧可赞，为变法而牺牲的结局可叹。其变法中关于整顿吏治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世总结和借鉴。



战国时期，随着精耕细作小农经济的兴起，各国掀起了空前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是论功行赏和奖励耕战，并通过严格贯彻新法，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吴起变法是战国时期持续时间较短但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变法运动。吴起凭借军事家特有的勇毅果决在楚国整顿吏治、打击旧贵族，成效突出，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4世纪初，战国七雄中的魏国经过变法运动，国力强盛，经常与赵国和韩国组成联军攻打楚国。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连克大梁（今河南开封）和榆关（今河南中牟）等楚国战略要地。楚悼王不甘受困，急于革除弊政、增强国力，遂于次年任命吴起为令尹，开始变法。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善于用兵，曾在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但在魏文侯死后受到政敌的排挤打击，于是自魏入楚，为楚悼王效命。作为一名军事家，吴起擅长观察

